

《钟敬文全集》的特征、价值与传承目标

董晓萍

当代中国在经济、综合社会治理和自然环境等方面都取得了快速发展，而悠久的历史文明始终是中国发展的基础。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出版了一批学术大师的著作，正是中国历史文明延续至现代社会发展的代表性成果，《钟敬文全集》是其中的一种。这套丛书共16卷，30册，1000余万字，由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先生的四代弟子与多学科著名学者47人次参与编纂，董晓萍主编，历时8年完成，高等教育出版社于2018年11月出版。该著是中宣部出版局国家重点图书项目，在北京师范大学985工程项目基础上进行，在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十三五”重大规划项目中拓展，是在中国学术文化各领域研究为数不多的拥有“民俗学的中国学派”地位的巨著。它的出版对于我国在全球化激烈竞争中，既要放眼世界，又要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向世界提供共享经验，也具有丰富的启示性。

一、体现中国整体文化的主体性特征

从文化上讲，古代中国已形成了自己的多元文化与治学传统，包括风谣传统、诗歌传统、文学传统、编年史传统、文论传统、戏曲叙事传统和民间科技传统等。各传统在中国社会历史背景下凝聚成中国整体文化，又在长期发展中分化为各自的阐释形态与杰作，有的还达到很高的程度，为世界其他文明所称道，如诗歌系统中的唐诗宋词、文论系统中的刘勰《文心雕龙》，编年史系统中的二十四史和地方志

等，戏曲叙事系统中的《赵氏孤儿》等，而中国民俗（包括民间文学）正是各种阐释和创作传统还没有彻底分开的产物。它的传承，走民间渠道和群众路线，但大量中国文人和官员也投入发明和分享活动，使之进入国家与地方知识系统，与其他各传统保持差异，也彼此互动，从另一个角度呈现出中国文化的样貌，也因其整体保留了中国文化的特质，而承载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部分。西方文化所发展的诗学、修辞学和阐释学，与这套中国传统学问完全是两个路子。

20世纪初，中国发生了新文学革命，但如果没有以上各种中国传统的成熟基础，就没有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没有民俗文化系统与之共生共荣，就不会有新文化思想的瞬间爆发，也不会有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等一批现代人文社会学科的群体诞生。基础就是基础，自我有基础而接触他者，与自我没有基础而拿来他者，这是两码事。接触和学了他者，学明白了，就要进一步认清自我基础，再学他者具备而自我没有的优秀成分，发展自我，大家也都发展。当然，在实际上，这个认识过程又相当漫长。有时人们留恋于比较，比较能够激发兴趣，但也容易流于简单化，仅从中国整体文化与民俗文化关系的角度说，只把民俗视为西方概念中的口头传统，而没有看到中国民俗是中国整体文化各传统尚未分解的产物，就是一种严重的误解。

在《钟敬文全集》中有大量的篇章告诉读者，自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至21世纪初，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各主要领域，包括文学、历史学、哲学、古典文学、现代文学、通俗文学、外国文学、文论点评、诗词小说、戏曲说唱等，钟敬文先生曾与诸多中国文坛宿将有长期密切的来往，如俞平伯、叶圣陶、夏承焘、聂绀弩、朱光潜、钱锺书、杨绛、吴文藻、谢冰心、王力、王瑶、廖辅叔、容肇祖、朱东润、唐弢、程千帆、陈原、夏衍、林默涵、季羨林、金克木、张岱年、王元化、王季思、缪钺、钱南扬、许钦文、臧克家、秦牧、黄秋耘、林林、林庚、敏泽、钱仲联、吕剑和袁鹰。凡中国的读书人，从中小学到大学都在阅读他们。这批文献都富有文学欣赏性，也极富中国文化风格（重点见第27册《学术

书信卷》)。第 19 册《国际交流卷》，反映了钟敬文先生的国际交往和学术视野。钟先生 20 世纪 30 年代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即投入抗日战争，后来由于社会变迁等原因，很难再出国，但是，留学海外的基础对他一生坚持学术开放都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印度的泰戈尔，德国的歌德和海涅，法国的雨果和罗曼·罗兰，英国的拜伦，俄罗斯的托尔斯泰，等等，都在他的研究与写作范围之内。他特别喜爱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为之发表了多篇文章，还在自己的民俗学著作中加以谈论。我们的问题是，钟先生的这种关注是出自单纯的外国文学观？还是从他者杰作中回看中国整体文化观呢？答案是后者。他说：“现在世界各国的文坛，正像各国的商场一样，日益强度地国际化了。特别是我们中国，她二十年来所表现的现象，证明了这种趋势的存在。这不是一种应该忧虑的事。……我们说到接受遗产（作为作家的修养而接受遗产），那除了很少数的本国所有珍品之外，不能不把国际上的伟大的创作品，来充当我们的‘目的物’。我们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对那‘全人类’的卓绝业绩的继承呢？”（《周译〈浮士德〉序》）。

《钟敬文全集》讨论这个核心问题的卷册，共 14 册，与全套 30 册相比，所占比例几为一半，余下的卷册告诉我们，中国民俗学研究是与整体文化紧密相连的，而离开整体文化的文化主体性是不存在的，这与那些单纯讲口头文学、故事流派、史诗传统和非官方民俗的其他许多国家的民俗学又是十分不同的。

《钟敬文全集》涉及中外书刊、中外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众多而复杂，所讨论的核心问题形成期长、历史跨度大、覆盖面广。在他的遗稿中，就留有日文、俄文和英文等多种语言的手稿，《全集》收录其这些文稿的社会背景、历史契机、文化环境和出版条件又各不相同，故对此要采取统一标准进行取舍是很难的，也是不能这样做的，故《全集》在编纂中，尽量保持历史原貌，体现这位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巨匠精神遗产的自身特征，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二、体现中国人文学科的基本特征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讨论《钟敬文全集》是有着特殊意义的。《钟敬文全集》说明，钟先生是如何将中国各个传统的现象收拢在一起，根据自我国情，参考他者先进学说，建设中国整体文化中的民俗学的。在第12册《民间传承文化学卷》中，讨论了“小学”“文学”与“史学”，这些都属于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传统人文学问，钟先生在此基础上建设中国民俗学的新学科。在它们中间，有一部分可以用民俗学的理论概括，如神话、故事、民歌和风谣，它们都比较简单，容易在多层文化中交流，被很多历史经典所记载；但也有一部分不能用民俗学理论总结，对此钟先生也未放弃，而是将之与中国整体文化一起讨论。仅从这两点看，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学说的建立，经历了交叉研究和综合研究的过程。为什么会如此？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分层与社会分层相纠结，而中国民俗传承历史久远，又始终与各种分层相伴随。第16册《文艺学卷》反映了他将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作为同中有异的理论现象，而不是对立文化现象，进行整体研究的深刻思考。第17册和第18册《鲁迅研究文存》是他为现代文学领域提供的独特成果。第10册的《〈水浒传〉专书研究》和《女娲研究》，第15册《民俗教育学卷》中的古典文学研究，第11册《民间传承文化学卷》中的国学、语言学、历史学、宗教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多学科讨论，这些都展现了中国民俗学这种人文学科的结构特点，这也体现了人文学科建设的基本特征。

《钟敬文全集》的编辑框架，尊重人文学科自己的历史，尊重民俗学发展的学术规律，综合整理、分卷编辑。对钟敬文先生已经出版的各种著述和散存各处的发表稿，以及大量的未刊手稿，竭尽全力搜集，做到各类文稿齐备。在处理所有文稿的过程中，以高度负责和精益求精的态度，分门别类地编排文稿，找出缺失的资料，核对档案文

献；对在有些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学术文献，均撰写背景说明；对钟敬文先生一生出入最多的民俗学、文艺学、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历史学和诗词学等学科的常用术语和不同时期使用的专门用语，均做出必要的知识性注释；对所有文稿与信件中的手写体难检字和异体字，都做了仔细的校勘。本次编辑工作的基本精神是，力求通过这套著作本身展示其固有的人文学科价值。

三、体现民俗学的中国学派内涵

钟敬文先生以百年人生，开创了中国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化学几大学问，建立了世界民俗学的“中国学派”。由于有以上阐述的“一”和“二”，中国民俗学派与西方民俗学就是两个不同的体系。《钟敬文全集》的第1册即为《中国民俗学派》，第2册至第15册依次为《民俗学概论》《民间文艺学》《民俗化学与文化史》《民间传承文化学》《历史民俗学》《民间艺术学》和《民俗教育学》，都在讲这类问题，它们告诉我们中西差距之大。钟先生于1949年回到祖国，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辅仁大学教书，1952年院系调整后，留在北京师范大学，开创了中国高校的民俗学学科。在上面提到的第27册《学术书信卷》中，记录了当时钟先生的创业历程。自1950年至1999年，他与中央和地方民俗学机构和社团的通信很多，这些通信在他的各类学术信札中历时最长，通信的范围也最广，遍布华北、西北、东北、华东、华南和香港等多个地区。纵观《钟敬文全集》，全面反映了钟敬文先生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历史成就，内容涉及学术研究、文学创作与研究、高等教育、学术社团建设、社会活动和国际交流等多个方面，展现了他开创中国民俗学理论体系和民俗学高等教育事业的独特贡献。

四、体现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品格

钟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历经坎坷和挫折，始终过着追求真理和坚持科学精神的高尚生活。他们在各自的学问上独领风骚，享誉中外，但仍然保持着多学科的合作。他们告诉我们，人文科学如何在互相依存中发展，在相互学习中壮大。他们用自己的学问人生激励后学要提升道德、培养定力、善于合作、追求卓越。

什么样的传统精神和文化资源能使这代人能够始终保持风骨和学术自信？这个问题，对于前人也许可不是问题，但对中国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来说就是一个问题。《钟敬文全集》回答了这个问题。第22册至25册的《诗词学卷》告诉我们，中国传统的诗学修养对他起了特殊作用。他经常引用刘勰的《文心雕龙》，这部文论对他有三个不同寻常的意义：一是养气，二是养文，三是养性。关于养气，指在人与自然高度合一的状态中达到相通透和能比喻的境界，由此反射学问与创作，如刘勰所说：“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就像云气那样变化多端，又像波涛那样汹涌起伏而变化无常。关于养文，是要将“才、气、学、习”综合处理，承认天赋，也要加强后天训练，达到“涵泳”的境界。关于养性，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中有专门讨论。钟敬文先生在一篇长文《我与我们的时代·祖国》中写道：“在1957年对知识分子的扫荡中，我就成了‘垃圾’，‘文革’中更是劫运难逃了。经过不断的烈风暴雨的袭击，接着来的是‘置散投闲’。像我这样的书呆子，是不惯于优游度日的，于是旧习难忘，加上一些同遭遇的朋友相戮，我重新燃起了诗炉的火。”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与俞平伯、叶圣陶在一起写诗论诗，完成了《钟敬文全集》第23册《白香词谱》的校注工作，他还说：“在这段不短的时间里，劳作之余，我购读了一、二百种古今诗集和词集。这不仅增进了我的诗学知识，也大大深化了我的人生修养（这种修养不是一般的书本知识所能代替的）。”

编辑出版《钟敬文全集》历时八年，让我们由衷地仰视这位学术大师。他的著作不是普通的精神遗产，而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进入现代学术文化宝库的珍贵财富。他的极为严谨的治学精神，他对于撰写和发表科学著述的极为认真、极富使命感的学者态度，他的勇于接受历史检验的知识分子胆识，以及他的亲近人民的巨大人格魅力，无时无刻不在感染着我们，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也应该同他的这批丰厚著述一起传承。

在我国 1950 年代评定的一批“一级教授”中，在出版《全集》方面，钟敬文先生可能是最晚的一位。应该说，《钟敬文全集》终得出版，得益于改革开放 40 年所创造的国家社会发展机遇、学术研究氛围和对外交流环境，这是毋庸置疑的。而本文所强调的有赖于对中国整体文化性质的认识，有赖于对中国人文学科性质的认识以及有赖于对中国民俗学特征的认识，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跨文化学建设才能解决，我们愿意用不懈奋斗去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去接近钟先生设计的目标并扩展它。